

寫在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施行前夕— 接軌國際實踐兒權，我國性剝削 防制工作變遷中的保護意識

廖美蓮

壹、前言

兒童性剝削被認定是一種性虐待（a form of sexual abuse）的形式（Pearce, 2014；廖美蓮，2016），也是一種性/別暴力（註 1）、一種權控（廖美蓮，2016）。性剝削經驗對兒童產生永久心理或生理上的傷害，且難以痊癒。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註 2）（以下稱兒權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RC）第 34 條清楚揭示各國應該保護兒童（註 3）避免受到任何形態的性剝削和性虐待（all forms of sexual exploitation and sexual abuse），包括：兒童遭受性侵害、利用兒童賣淫、利用兒童色情表演及兒童色情等，均視為是對兒童的性剝削（廖美蓮，2015）。兒童性剝削（Child Sexual Exploitation, CSE）（註 4）在臺灣已不是創新的社會議題（Cole et al., 2016；王曉丹，2015），政府各個體制—尤其是主管這個

業務的社政與社福系統的各個層級—對兒童的理解在過去的二十年中發生了許多變化，然而這些變化一直無法讓防制網絡的工作者懸置（bracketing）（註 5）（Ely et al., 1990 cited in Liu, 2007）對涉入性產業的兒少存在質疑。性剝削的被害兒少始終無法被認定與《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稱兒少權法）中所指的性侵害保護個案是一樣的兒少，許多基層社工憂慮新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以下稱兒少條例）讓兒少與陪偵社工的專業關係更形拉扯；不少實務工作者也注意到多元處遇工作模式的法律規範在兒少保護資源嚴重不足的困境下仍處於茫然階段。

研究指出對兒少的性剝削行為將使未成年人產生「多重複雜的創傷」經驗（Graham & Wish, 1994），諸如創傷後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Farley et al., 1998；Tsutsumi et al., 2008）、損害兒少自我價值感、破壞其人際

關係界線、對他人的不信任感(Curtis et al., 2008; Smith et al., 2009)、自殺念頭(Greene et al., 1999; Van Brunschot & Brannigan, 2002)、焦慮和沮喪(Tsutsumi et al., 2008)、物質成癮等(Nadon et al., 1998)(引自 Cole et al., 2016)。為確保兒童受到保護及照顧其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需求得到滿足，修改法條，依據公約規範的精神，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的準則。同樣是兒少族群，性剝削相對於其他不同受虐類型的兒少，受到隱而未現的刻板價值與差別待遇，亦即兒少同樣都位在受到不當對待的困境，卻有不同的處遇；欲解決此一問題，應以國家制訂的法律與社會規範的形成並重，且彼此發展出合作關係。未來法律新典範；然而，朝向此一方向發展的困難似乎主要在於觀念上。如表 1 深色區塊的文字－「兒童及少年性交易查獲人數」的敘述方式也是一種社會真實的建構。這個類別的文字說明所

指涉的兒少，究竟是保護性還是犯罪性？不僅語言本身弔詭，同樣是保護個案，一旦牽涉到性產業，就很難將「兒少主體」看成是一塊鐵板的整體。難道說兒少保護系統內的虐待類別也有再細分差序格局，如同表 1 明明都是統計兒童少年受虐人數與受虐類型，然而兒少性剝削的類型為何被排除在統計表之外？這些統計文本似乎也承載著政府管理者的眼光，意味著管理者對兒少保的想像與思維也許未能符合公約第 2 條「締約國應尊重本公約所揭櫫之權利，確保其管轄範圍內之每一兒童均享有此等權利…」。¹兒童權利委員會更呼籲締約國針對弱勢兒童提供特別協助，並透過積極手段協助該等兒童脫離弱勢處境(林沛君, 2015)。因此，當社工被要求要將兒少性剝削視為保護個案之規格處理時，這個統計表卻又讓社工產生認知的斷裂與矛盾。

表 1 兒童少年受虐人數與受虐類型(含兒少性剝削)

年別 Year	兒童少年受虐類型 (複選) (人次)By Types(Multiple Options)(Person-Times)																
	合計 Total			遺棄 Abandon		身心虐待Physical Emotional Abuse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 查獲人數		其他 Others	
						身體虐待 Physical Abuse		精神虐待 Emotional Abuse		性虐待 Sexual Abuse		疏忽 Neglect					
	計 Total	男 Male	女 Female	男 Male	女 Female	男 Male	女 Female	男 Male	女 Female	男 Male	女 Female	男 Male	女 Female	男 Male	女 Female	男 Male	女 Female
100年, 2011	20,690	9,608	11,082	126	143	4,329	3,853	1,058	1,179	346	2,002	1,437	1,291	23	414	2,289	2,200
101年, 2012	21,854	10,179	11,675	112	87	4,342	3,723	1,156	1,254	367	2,348	1,401	1,200	11	355	2,790	2,708
102年, 2013	17,965	8,260	9,705	87	90	3,308	2,924	849	970	400	2,096	979	831	31	285	2,606	2,509
103年, 2014	12,782	5,778	7,004	56	43	2,167	1,779	665	685	303	1,661	651	598	15	248	1,921	1,990
104年, 2015	10,507	4,971	5,536	43	39	1,845	1,571	546	562	254	1,168	683	569	23	319	1,577	1,308

* 作者自行整理自原先單獨統計之「兒童及少年性交易查獲人數」(取自衛福部保護司歷年的兒童少年受虐類型統計彙整)。

年別 Year	合計 Total			遺棄 Abandon		身心虐待Physical Emotional Abuse								其他 Others	
						身體虐待 Physical Abuse		精神虐待 Emotional Abuse		性虐待 Sexual Abuse		疏忽 Neglect			
	計 Total	男 Male	女 Female	男 Male	女 Female	Male	Female	Male	Female	Male	Female	Male	Female	Male	Female
100年, 2011	20,253	9,585	10,668	126	143	4,329	3,853	1,058	1,179	346	2,002	1,437	1,291	2,289	2,200
101年, 2012	21,488	10,168	11,320	112	87	4,342	3,723	1,156	1,254	367	2,348	1,401	1,200	2,790	2,708
102年, 2013	17,649	8,229	9,420	87	90	3,308	2,924	849	970	400	2,096	979	831	2,606	2,509
103年, 2014	12,519	5,763	6,756	56	43	2,167	1,779	665	685	303	1,661	651	598	1,921	1,990
104年, 2015	10,165	4,948	5,217	43	39	1,845	1,571	546	562	254	1,168	683	569	1,577	1,308

* 本表為衛福部保護司歷年的兒童少年受虐類型統計原表。

貳、兒權公約國內法化讓保護不再只是一種選項

我國於 2014 年 11 月 20 日已正式通過《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其中第 2 條規定：「公約所揭示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成為我國保障兒童人權的重要基石，也體現舊法《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的法律用語、處遇模式等與兒童公約的規範及精神不相符，立法院爰於 2015 年 1 月通過修法，為接軌國際兒權公約的規範與精神（涵蓋兒童權利的四大範疇：生存、發展、保護與參與），將法條逐條修正並更名，同時確認兒少的需要，讓兒少不再只是無聲的受保護客體，而成為社工評估與處遇的主體，並尊重兒童人權，任何保護行動必須符合兒少的最佳利益（註 6）。為達成真正的轉變，兒權公約雖然並未精準的定義「最佳利益」，但依據第 14 號一般性意見中明確地建議「決策者應建置一套可供立法者、法官及行政部門無論是公或私部門等得以落實確保兒童最佳利益之機制，協助其進行兒童最佳利益的評估」（高玉泉、蔡

沛倫，2016: 21）。

衛生福利部保護司以整整一年的時間準備，2016 年台灣展翅協會委託我研擬 24 小時「必要安置指標核對表」（LSCB, 2015; 廖美蓮，2016）、編寫性剝削防制條例工作手冊（反思與實作系列二）；2016 年末，我也受邀參與了保護司舉辦之 105 年度全國「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工作共識營（註 7）」的專講與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 24 小時必要安置指標（註 8）北、南兩場工作坊的訓練計劃，凡此種種新法上路之前置作業，均體現一本兒童人權公約的法典所連動相關法規及行政措施的全面檢視與修正是多麼不容易，需要多少無名的兒少保精兵在背後辛苦付出、堅守崗位。

終於走到 2017 年的歲首，也是性剝削防制條例正式施行新里程的起點，兒權公約已確立兒童為權利的主體、不論兒少之意願，一律採「保護」觀點（林沛君，2015；李麗芬，2016），讓兒少被害人本身的脆弱性（註 9）交織其他不利因子的處境得以被看見。相較於舊法《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時代，社工以兒少被害人是否有從事性交易之虞（實）的行為事實作為

評估安置處所的依據，新法施行後，為履行兒權公約規範與實踐公約精神，免不了讓所有涉入其中的專業人員都倍感挫折與壓力。經過一場共識營與兩場工作坊之後，我愈加體認性剝削防制工作真是華路藍縷，儘管法律條文、精神與公權力已構成國家的法律整體，然而被害人的脆弱性是否真的就能夠突顯？若從運動者的觀點，君不見國家雖已建制防制性別暴力的法律，女人的身體為何持續在公、私領域被欺壓與傷害的情事仍隨處可見（王曉丹、扶停雲，2015）。法律雖做為社會實踐的機制，但徒法不足以自行，保護規範並不理所當然就能通通到位，必須仰賴其他防制網絡間的專業合作，而下列幾個問題意識的辯證恐怕仍是翻轉觀念與否的關鍵。

參、法律是兒少脆弱處境被濫用的敘事還是具有揭露兒少脆弱處境的作用

以跨國性剝削事件來說，在《人口販運防制法》立法前，社會的真實往往是建構有一群人想賺錢，從另外的國度來臺灣，產生千奇百怪的糾葛；但是當法律敘事重寫個人生活經驗，被害人變成脆弱處境被濫用的敘事（王曉丹，2015）。既然新法以兒少為「福利的主體」，那麼，首先必須拆解兒少性剝削防制網絡成員糾葛了20年的誤解－以支持妓權的觀點將未成年兒少涉入性產業視為無異於成年人選擇性工作。由於受到社會總體對性、性產業

的偏見及至歧視（註10）的影響，隨之失焦的乃是忽略了「兒童」是世界上最脆弱的人口（Lalor & McElvaney, 2010）之事實。研究（Bang et al., 2014）指出當未成年的孩子成為性剝削的受害者，對任何國家的社會、經濟和個人發展的後果都相當不利（引自廖美蓮，2014/2016）。

12歲以下兒童，鑑於其年齡的因素，在剝削、虐待、暴力與忽略事件中，在24小時必要安置指標視為是高危險群的保護個案。然而，單就年齡一個向度便定義兒少為脆弱族群也要避免流於過度簡約，因此必須同時考量兒少的自我保護能力（the capability for self protection）（Childline India Foundation 網站）。不可諱言，兒童的脆弱性往往是其生長與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自我保護能力」在國外的定義係涵蓋兒少能否提供自己基本生活所需、自己對抗危險情境的能力、及辨識自己已置身潛在危險情境等。欲評估兒少脆弱處境，下列各項因素都是重要的判讀指標（Action for Child Protection 網站）：

1.年齡：年齡愈幼小的兒童，愈倚賴保護性系統，尤其6歲以下之人。

2.身體障礙。

3.精神障礙。

4.挑釁行為：由於對兒少的精神健康或行為問題的知識匱乏或誤解，成人可能變得煩躁或沮喪，在此種情況下做出打擊或完全忽視兒少等不適當之回應。

5.缺乏權力：視環境和兒少週遭的情況。好比說兒少若被國家、家庭或社區賦予權力參與並履行自己的權利和責任（像

是兒權公約)，可降低他們的脆弱性。

6.缺乏捍衛能力：源於國家或家長或社區缺乏保護能力。好比說國家沒有兒童權益保障的法律，兒童就難以保護自己免於遭受虐待。

7.被動：源於兒少本身的弱勢或被惡意對待。例如，童工必須接受壓迫而無法尋找求助的方法。

8.非外表能看出來的診斷：例如智能障礙、過動症、自閉症、亞斯柏格症或學習障礙。

9.疾病。

10.社會與經濟的脆弱性：促使女性涉入性工作的關鍵因素（Hoque, 2010）。

此外，Pearce（2009/2014）從其研究中揭露 5 項脆弱特徵是導致兒少涉入性剝削的風險因素：

- 1.本身是兒保個案。
- 2.中輟問題。
- 3.學習障礙。
- 4.毒品與酒精問題。
- 5.經濟貧窮。

女性主義法學學者批判兒童的脆弱性被法律先敘事後論證成為「不能、不知或無法求助」的弱者（王曉丹，2014）。探討兒童脆弱性，在社政系統介入兒童保護工作處遇過程，確實是受到高度關注的議題，被害兒少的「保護圖像」歷經建構、解構、再建構與再解構的法律與社會制度面過程，來來回回。當然，脆弱只有在不被適當對待的兒少身上才能夠作用，值得保護系統的成員再深思的是，圍繞在被害人身邊的法規/關懷與指標或研究會不會

只是圍繞在一個出於想像的受性剝削兒少，而我們所面對的卻是一個真實的人而不是她的表面議題。

肆、兒少在保護機制的失語－性道德客體與生存結構性威脅競逐

心理暨社會學派提出「人在情境中（person in situation/environment）」是社會工作非常經典與重要概念，論述服務對象的生存環境/情境（及其脈絡）是社會工作的重要工作場域，與受助者息息相關。個人經驗與特定地理和歷史脈絡下的社會、文化、政治和經濟因素之間是密不可分的，也會受到影響。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的資料顯示：每年有 1.2 百萬的兒童遭到販賣，他們被性剝削的同時也遭受著身體或性暴力的對待；約 43% 遭受性剝削的受害者為女性與未成年人（引自 Rahman, 2011）。西方研究透露兒童早期的「性虐待」經驗是促使她們掉入性剝削情境的危險推力（Glover, 1960；引自 Kong, 2006）。李麗芬（2012）指稱台灣展翅協會服務對象中有九成性剝削兒少曾有遭受性侵害的經驗，此與國內學者陳毓文（2016）執行《性剝削抑或性交易？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工作服務個案之需求與策略探究》的研究文獻整理以及其研究發現結果相近。

為了不讓沈默變成結構的共犯，兒權公約第 19 條規定「不受任何形式之身心暴力、傷害或虐待、疏忽或疏失、不當對待

或剝削，包括性虐待」、第 32 條規定「兒童免於受經濟之剝削」、第 34 條規定「免於所有形式之性剝削及性虐待」、第 35 條「防止兒童受到任何目的或以任何形式之誘拐、買賣或販運」、第 36 條規定「兒童免於遭受任何其他形式剝削之權利」，而兒童性剝削不同於人口販運的保護，它不需要檢具強迫、欺詐、脅迫的證據，因為未滿 18 歲的兒童不具備同意與他人發生性行為的能力（Boxill & Richardson, 2005）。只可惜臺灣性剝削防制網絡中的實務工作者，過去受到法律文本影響他們對問題的理解，又常常因為在救援的過程中，聽見兒少自述『同意選擇』，而忽略其背後的社會結構存在著一種看見/隱藏的權力控制機制，學者（Rahman, 2011）認為兒童性剝削是一種結構性壓迫的選擇，藉由下列幾個情境因素造成：

1. 資訊模糊：兒少應徵時所獲知的工作內容與實際工作之間存有落差。
2. 監控自由：販運到其他國家後，經歷監控、失去人身自由。
3. 經濟控制：無止盡的債務償還。
4. 意識型態：物化女性或以兒童獲取利益之名（被框定為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2 條所指稱之對價的範疇）。

Gilligan（1997）提出「暴力細菌理論」，論述暴力與父權體制密不可分，父權文化造就男性必須透過展現力量來獲得尊重，暴力本質也是一種力量的展現。那麼，性暴力宛如細菌一樣無所不在，透過各種形式施於身體、性、心理、情緒等方面，發生在家庭、學校、社區、職場、人際網

絡，甚至網路世界等不同的地方，對兒童被害人的心理產生莫大創傷，及至影響其未來的發展（Gozdziak & Bump, 2008），威脅兒童的生存發展、破壞家庭關係、阻礙教育機會，耗費社會資源與付出極高的成本，無怪乎兒童性剝削議題係全球性的危機（Rahman, 2011; Svensson, 2006）。兒童人口販運（註 11）（Child human trafficking）與兒童性剝削都是成長速度快又最有利可圖的犯罪性活動（Hill & Carey, 2010; Rafferty, 2013）。

從許多學者反省的結果，不難發現全球化正是帶動邊陲國及邊緣化族群遭勞動與性剝削的主因（Candappa, 2003; Rafferty, 2013），當全球化遇上高貧困的議題，益發加深未開發或開發中國家的兒童人口被販運的可能性，在在證明，「性」的真正元兇不僅是性消費者或性剝削加害人，而是缺乏兒童人權觀念的區域、社會或國家未能善待弱勢婦女與幼童，或相信兒童是自願性選擇進入性產業。兒少性剝削的社會現象，反映了社會對「性存有」（sexual being）需求的強度，提供自由市場空間，但是不能因為司空見慣就便宜行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註 12）（CEDAW）施行法」業於 2012 年 1 月 1 日在臺灣施行，第 6 條明確規範禁止販賣婦女與使婦女賣淫，規定「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販賣婦女及意圖營利使婦女賣淫的行為」。接著，該如何繼續省思我國的兒童少年性剝削防制/治工作與保護工作，老實說未成年的「性」真是個複雜議題，因它不僅包括生

理的、心理的，亦有社會與文化的意涵，在目前的性剝削保護系統內有著既是受到社會監視、規訓，又被忽略個人主體性的矛盾存在（楊幸真，2010）。接下來將針對發展性剝削被害人在新法與公約中的權利實踐與落實策略有進一步的討論與思辨。

伍、重塑兒少保護新典範

無論兒少是遭受集團式控制的性剝削（被迫）而主動求助，抑或是在八大行業稽查中獲救（自願），學者主張兩者在復原歷程和保護需求大同小異；又，不論兒少是否在遭到性剝削與販運前就已受到性虐待、或因販運經驗而產生創傷後症候群，透過建立安全網絡與結盟，重頭細思防制工作的首要任務必然是避免兒童再受到任何形式的性的傷害（McIntyre, 2014）。弔詭的是，為什麼兒少條例與兒權公約國內法的施行，讓所有牽涉其中的人充滿挫折？社會工作是一門關注弱勢群體貧窮之基本生存權和人為受壓迫的不平等、不正義的專業，當前全球化帶來新的結構關係，必須以新的觀點、新的覺察或新的行動方式，才能適當因應全球化變遷下的社會議題與國際視野，這是值得社會工作者思辨的知能，例如批判反思性剝削兒少在特定的社會、文化或經濟脈絡中的權力關係運作是否存在未經體察之結構性壓迫與被壓迫關係，學者甚至提出「照顧鏈」（註13）的概念；我們要問的是，在變遷中，保護網絡的助人者與各安置場所的實務工作者如何組織與思辨，才能落實公約精神

與使命，並提供最佳兒童利益的在地化服務（Payne & Askeland 著、李明政譯，2012）。

原有的典範，可視為是保護網絡成員間固守的思維眼光與工作模式；當社會變遷，產生結構性變化後，其所發展出的解決方案，未必有效對症下藥，亦往往無法掌握住新興課題的關鍵事實；若能將兒少性剝削問題的探索，提升至尋找法律新典範的層次，將別具意義。新法（兒少條例）與公約國內法執行現況，試圖防止或杜絕在地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等將兒少捲入性產業的壓迫議題，由於背後牽動的都是複雜的體制，這些法治也許脫離現實感而不理想、缺乏思考、資源嚴重不足與失衡，使新法的效果難以期待；但是這個作用揭示另一種可能的圖像，並提供一種社工評估的新思維。這讓我想起 Michael White（2005）提出將「問題外化」（externalization of the problem）是後現代取向的敘事心理治療很重要的觀點之一（列小慧，2009），透過「問題外化」釐清過程，當事人有機會從不同的角度，重新認識自己所面臨的處境或問題，也因此帶來改變的契機。White 所強調的外化不只是一種治療技術，更是一種態度，一種看人的態度，透過我們的服務對象一再凝視自己，才能對自己產生真正理解與不同角度的認識（周志健，2002）。畢竟，過去20年的消極保護與積極監控的專業威權時代已經無法面對這個大環境結構的變遷與後現代時代衝擊社會工作的在地詮釋（Payne & Askeland 著、李明政譯，2012）。

陸、結論：未來及建議

正確的兒少保護意識是新法與公約成敗的關鍵。臺灣的兒童保護制度主要依附在每次修法或是更動而逐漸建制（鄭麗珍，2015），唯有落實兒權公約國內施行法與兒少條例才能讓臺灣建立專業的防制網絡。20年過去了，防制網絡成員仍將「性不能作為生存工具」的道德論述做為一種反應式思考（承前所述，依公約精神，兒少無權同意與他人發生性行為並非道德論述，而是保護脆弱兒少之必然），抗拒檢視與質疑將兒少一律強制安置（註14）的預設立場。由於新條例在價值、類型、處遇服務與罰則等均有大幅度之修正，故有必要針對網絡成員進行說明，知法進而用法；而社工須於24、72小時內完成是否返家的評估，承受壓力之大可想而知，故一線社工依據兒少條例第15條指示「評估被害人就學、就業、生活適應、人身安全及其家庭保護教養功能，並做處置」的「24小時必要安置指標」的存在實有必要。此外，隨著處遇流程的改變，處遇多元化，更需建立一套工作架構與方法提供實務者參考，如此方能整合兒少性剝削防制工作網絡力量，強化專業服務品質，有效推動兒少性剝削防制工作。並藉由兒權公約

CRC的眼光來反思兒少保護的口號與體制內保護行動的更多可能，諸如讓安置處所更為多元，以及親屬和寄養家庭（註15）亦可作為安置選項等。畢竟，事後以懲罰或是治療來試著復原傷害，對受害者和施暴者都稍嫌太晚，因此未來的工作方向與策略，一定是強調對兒少性剝削暴力的預防（Gilligan, 1997）。

其次，典範的探索，重新省思過去將兒少被害人他者化，並汙名他們為性道德客體的思維層次，也思辨反壓迫實務工作的論證。Burke & Harrison（2002）論述壓迫的本質即為將生活在社會中的弱勢群體排擠到邊緣、非主流的位置，如同兒少性剝削被害人遭到保護系統之排除；作為防制網絡的一份子，我們應具備道德、倫理和法律上的責任去翻轉社會的不平等和劣勢（不利的生存條件）。觀念的翻轉是本文的核心，實踐「以兒童為權利主體」的典範，有賴科際整合的模式，必須同時涉及司法、社政、警政、教育、衛政以及全民一起參與，缺一不可。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關鍵詞：保護意識、兒童性剝削、兒童權力公約、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

註釋

註1：性/別暴力（Gender-based violence）為國際上重要的公共衛生及人權議題（Okemgbo et al, 2010）。性/別暴力被視為「男權文化的產物」，是整個文化的陰謀，不僅讓女

性受制於外在的強暴犯，更讓多數女性在安全的考量下，接受其他陽剛化圖像之男性（父/夫/兄/男友）的管理與規訓，成為男人的性禁癮（劉毓秀，1991）。

註 2：在 1989 年 11 月 20 日，聯合國大會一致通過專為兒童而設的公約—《兒童權利公約》，保障所有 18 歲以下之兒童及少年擁有基本人權（UN, 1989）；《公約》首次指出，兒童與成人一樣，與生俱來享有人權，包括：醫療、教育、受保護及獲平等機會發展的權利。

註 3：《兒童權利公約》第 1 條將兒童界定為“18 歲以下的任何人，除非對其適用之法律規定成年年齡低於 18 歲”。

註 4：兒童性剝削（CSE）的例子包括利用未成年人賣淫，由皮條客控制未成年人的性活動，在脫衣舞俱樂部，按摩院，網路性網站或上傳色情圖片等（Cole, et al., 2016）。

註 5：根據 Ely 等人之研究，‘bracketing’（懸置）的意思是個人透過意識層次暫停對對方的既定假設、信念、感受，以便能夠在現場更具備能力還原本質而認識對方的經驗。

註 6：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係《兒童權利公約》第 3 條第 1 項的規定。

註 7：2015 年 10 月 27-28 日舉行之全國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工作共識營，係由衛生福利部保護司委託，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承接辦理。

註 8：衛生福利部保護司安排北、南兩場 24 小時必要安置指標工作坊，分別於 2016 年 12 月 12 日與 23 日委託台灣展翅協會辦理。

註 9：兒童的脆弱性在本文中主要指涉那些遭受虐待、剝削、疏於照顧的兒童；而兒童保護的任務就在於應付弱勢兒童群體的需要。

註 10：兒權公約第 2 條第 1 項規定，締約國應尊重本公約所揭櫫之權利，確保其管轄範圍內之每一兒童均享有此等權利，不因兒童、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之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主張、國籍、族裔或社會背景、財產、身心障礙、出生或其他身分地位之不同而有所歧視。

註 11：依據我國人口販運防制法第二條的定義：2009 年通過「人口販運防制法」，該法第 2 條第 1 項人口販運定義之第 2 款：「意圖使未滿 18 歲之人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其器官，而招募、買賣、質押、運送、交付、收受、藏匿、隱避、媒介、容留未滿 18 歲之人，或使未滿 18 歲之人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其器官。」意即只要有除了兒少、嫖客之外的第三人存在，兒少即為人口販運被害人（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2014；李麗芬，2012）。

註 12：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通過的一般性建議 12 與 19（1989）。第 12 號一般性建議：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公約》第 2、5、11、12 和 16 條規定各締約國採取行動，保護婦女不受發生在家庭、工作崗位或其他社會生活領域內的任何暴力行為之害。考量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第 1988/27 號決議，建議各締約國在其提交委員會的定期報告中列入以下情況：

1. 關於保護婦女在日常生活中不受各種暴力行為之害的現行立法（包括性暴力、家庭內的虐待、工作地點的性騷擾等）；
 2. 為根除這些暴力行為而採取的其他措施；
 3. 為遭受侵犯或虐待的婦女所提供的支持服務；
 4. 關於各種侵害婦女的暴力行為發生率，以及暴力行為受害婦女的統計資料。
- 以及第十一屆會議（1992）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對婦女的暴力行為背景：
1. 基於性別的暴力，是嚴重阻礙婦女與男性平等享受權利和自由的歧視形式。
 2. 1989 年委員會建議締約國在其報告內，列入關於暴力及因應暴力所擬定措施的資料（第八屆會議第 12 號一般性建議）。
 3. 1991 年第十屆會議，委員會決定在第十一屆會議分出部分時間，討論並研究第 6 條，以及關於對婦女的暴力行為、性騷擾與色情剝削的其他條款。選擇該主題是為 1993 年世界人權會議作準備，該會議根據大會 1990 年 12 月 18 日第 45/155 號決議規定召開。
 4. 委員會的結論認為，締約國的報告沒有充分反映出歧視婦女、以性別為基礎的暴力、侵犯人權和基本自由之間的密切關係。《公約》的充分執行需要締約國採取積極措施，消除施加於婦女一切形式的暴力。
 5.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審查其法律與政策，根據《公約》規定提交報告時，應顧及委員會針對基於性別的暴力所述意見。

註 13：「照顧鏈」（care chains）概念是全球化下的產物，指某一特定社經地位的人們，因為有經濟能力但缺乏時間，「照顧鏈」應運而生，與全球商品鏈（global commodity chains）、冷藏鏈（cool chains）是相似的意涵，不同在於商品的差異。值得關注的是，這樣的照顧鏈，延伸到從事非法性產業工作的婦女身上（Payne & Askeland 著、李明政譯，2012）。

註 14：依據兒權公約第 9 條締約國應確保不違背兒童父母的意願而使兒童與父母分離。但主管機關依據所適用之法律及程序，經司法審查後，判定兒童與其父母分離係屬維護兒童最佳利益所必要者，不在此限。關於何者為「必要」之分離，林沛君（2015）指出法條並無提供此二字的一定標準，但根據 UNICEF 就兒權委員會歷年來彙整之意見，例如因父母缺乏經濟能力或無固定居所而將子女強制安置的

案件，因貧窮或暴力等因素而導致兒童逃家、於街頭工作或遭父母遺棄的情況等比不構成必要（necessary）之親子分離。

註 15：適用於前條公約精神。

參考文獻

- 王曉丹（2014）。〈法律繼受與法律多重製圖－人口販運法制的案例〉。《中研院法學期刊》，15：77-137。
- 王曉丹（2015）。〈「拆解」防治性別暴力的法律：文件格式化、敘事失語以及文本性現實〉。《性別平等教育季刊》，71：37-43。
- 王曉丹、扶停雲（2015）。〈在法律中「做」性別〉。《性別平等教育季刊》，71：10-12。
- 列小慧（2009）。《敘事從家庭開始－敘事治療的實踐歷程》。香港：突破出版社。
- 周志健（2002）。《敘事的治療與實踐－以一個諮商個案為例的敘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究輔導系碩士論文。
- 李麗芬（2012）。〈論「兒少性交易」為何應正名為「兒少性剝削」〉。《社區發展季刊》，139：282-287。
- 李麗芬（2016）。〈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之精神與價值〉載於《反思與實作系列之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工作手冊第一章，頁 7-12》，未出版。臺北：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
- 林沛君編（2015）。《兒少人權向前行－兒童權利公約逐條釋義》。臺北：台灣展翅協會。
- 高玉泉、蔡沛倫（2016）。《兒童權利公約逐條要義》。臺北：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 陳毓文（2016）。《性剝削抑或性交易？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工作服務個案之需求與策略探究》。取自 <https://srda.sinica.edu.tw/news/news/1313>（12/20）
- 廖美蓮（2015）。〈被閹割的情慾？兒少性交易防制工作－在地實踐知識的反思〉。《社區發展季刊》，149：110-114。
- 廖美蓮（2016）。〈兒童少年性剝削防制工作指引〉載於《反思與實作系列之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工作手冊前言，頁 2-6》，未出版。臺北：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
- 楊幸真（2010）。〈導論：青少年的性〉，載於楊幸真（主編），《青少年的性》，（1-18 頁）。臺北：巨流。
- Action for Child Protection(2003). The Vulnerable Child. Retrieved from:
<http://action4cp.org/documents/2003/pdf/Feb2003TheVulnerableChild2.27.pdf>
(Dec 31, 2016)

- Bang, B., Baker, P., Carprinteri, A. and Van Hasselt, V. B. (2014). Commercial Sexual Exploitation of Children. New York, NY: Springer.
- Boxill, N. A., & Richardson, D. J. (2005). A Community's Response to the Trafficking of Children. The Link: Connecting Juvenile Justice and Child Welfare, 3, 1, 3, 9.
- Burke, B. & Harrison, P. (2002). 'Anti-oppressive practice', in Themes issues and Critical debates. Adams, R., Dominelli, L., Payne, M. Basingstoke, UK: Macmillan, pp.229-239.
- Childline India Foundation (2016). Child Protection & Child Rights, III. Vulnerable Children. Retrieved from: <http://childlineindia.org.in/vulnerable-children.htm> (Dec 31, 2016)
- The Vulnerable Child. Candappa, M. (2003). Scoping Exercise on Trafficking of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to and Through the UK. Report to the Save the Children, UK (unpublished).
- Cole, J., Sprang, G., Lee, R. and Cohen, J. (2016). The Trauma of Commercial Sexual Exploitation of Youth: A Comparison of CSE Victims to Sexual Abuse Victims in a clinical Sample.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1(1), 122-146.
- Ely, M., Anzul, M., Friedman, T., Garner, D. and A. C. Steinmetz (1991). 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Circles within Circles. London, England: Falmer.
- Gozdziak, E. & Bump, M. N. (2008). Victims No Longer: Research on Child Survivors of Trafficking for Sexual and Labor Exploit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NIJ Document No. 221891).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 Hill, A., & Carey, R. (2010). The Trade in Human Lives. Americas Quarterly, 4(2), 84-89.
- Hoque, M. S. (2010). Female Child Trafficking from Bangladesh: A New Form of Slavery. Canadian Social Science, 6(1): 45-58.
- Kong, S.K. (2006). What It Feels Like for a Whore: The Body Politics of Women Performing Erotic Labour in Hong Kong Gender, Work and Organization, 13(5), 409-434.
- Lalor, K. & McElvaney, R. (2010). Overview of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Child Sexual Abuse in Europe. In Council of Europe, Protecting Children from Sexual Violence -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Strasbourg: Council of Europe.
- Liu, Miriam M. L. (2007). Issues in Father-Daughter Incest Intervention in Taiwa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ull, East Yorkshire, England.
- Lewisham Safeguarding Children Board (LSCB) (2015). Child Sexual Exploitation Risk Assessment Guidance. London, England: Lewisham.
- McIntyre, B. (2014). More Than Just Rescue: Thinking Beyond Exploitation to Creating As-

- essment Strategies for Child Survivors of Commercial Sexual Exploita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57(1), 39-63.
- Pearce, J. (2014). What's Going On' to Safeguard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from Child Sexual Exploitation: A Review of Local Safeguarding Children Boards' Work to Protect Children from Sexual Exploitation. Child Abuse Review, 23: 159-170.
- Rafferty, Y. (2013). Child Trafficking and Commercial Sexual Exploitation: A Review of Promising Prevention Policies and Programs.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83(4), 559-575.
- Rahman, M. A. (2011). Human Trafficking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Case of Trafficking in the Global Market Economy. Transcience Journal, 2, 54-71.
- Svensson, N. L. (2006). Extraterritorial Accountability: An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ld Sex Tourism Laws. Loyola of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view, 28, 641.